

迷走

譯後記

我所譯的兩篇文章〈生命：經驗與科學〉與〈何謂科學的意識形態？〉，都與法國科學史家喬治·岡居朗（1904— ）有關。然而岡居朗這個名字在台灣是很陌生的，而他所研究的學科「生命科學史」（History of Life Science），正如傅柯在文中所說的，絕非一個引人注目的學科。

記得在這份刊物籌備期間，有位朋友提出了一項質疑，問道，介紹這麼多五花八門的外國理論，有些人連名字都沒聽過，對我們究竟有何意義？在台灣脈絡下有何意義？我想岡居朗大概也是從沒聽過的名字之一，在此更應提出些介紹與說明。

岡居朗，就如同巴塔依（George Bataille）一樣，是對當代法國思想有深遠影響的人物，然而他們不像傅柯、德希達或德勒茲這類耀眼的明星，在奇峰迭起令人目炫的法國思潮中，他們是底下一股強而有力的暗流，往往只有當我們在追溯這些思潮源流時，才會注意到他們，而且往往忽略了他們思想本身的重要性。

傅柯寫的這篇文章，有些形容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這是學生對老師的溢美之辭，其實不然。就以文中提到的一些人物為例，阿杜塞曾說：「我所虧欠於岡居朗的是無可計數的」¹；而波迪爾也提到：「像岡居朗…這樣的人對我及少數其他人而言，是韋伯式的「模範先知」（exemplary prophets）。……他們似乎指出了新的道路的可能性，一個新的方式來完成哲學家的角色。」²不止於此，他事實上是建立法國的生命科學史這門學科的重要人物之一，對這門學科後輩的史學家如傅柯、拉

庫赫 (Dominique Lecourt) 、達戈涅 (François Dagonet) 、利莫格 (Camille Limoges) 及德拉波特 (François Delaporte) 有重大的影響。而且他給這門學科帶來強烈的哲學的、認識論的導向。

岡居朗原本是接受哲學訓練的，在他開始教授哲學時決心再去唸一個醫學學位，他的理由如下：「對一個哲學教授而言，他沒有必要爲了多了解心理疾病而對醫學感興趣，也沒必要去實地操作一門科學的學科。我所寄望於醫學的，只是對具體人類問題的引介。醫學在過去與現在對我而言似乎一直是位在數種科學交叉口的一種技術或一種藝術，而非嚴格意義下的科學。關於科學與科技之關係，及規範 (norms) 與規範性 (正常性normality) 之間的關係這兩個問題，我想可以由受過醫學訓練的人做出更精確的陳述與更完整的闡明。」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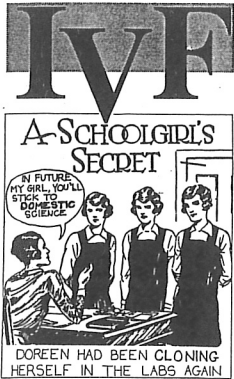
岡居朗本人在思想上深受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的影響，尤其是後者有關認識論決裂 (epistemological break) 的概念，不過他也對巴舍拉的學說提出了不少的批評與修正。1955年岡居朗接任巴舍拉擔任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的負責人，直到數年前退休爲止。

這裏所譯的兩篇文章中，傅柯的〈生命：經驗與科學〉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現代哲學史發展中，爲岡居朗定位，並指出他的重大貢獻。而岡居朗的〈何謂科學的意識形態？〉則是他晚期著作《生命科學史中的意識形態與理性》(1977) 的第一章，代表了他晚期的一些觀點。岡居朗在書中表示，1967—68年間，在傅柯及阿杜塞的影響下，他開始處理意識形態的問題，引進了科學的意識形態這個概念。此外在此書中，他對英美以孔恩 (T.S.Kuhn) 爲代表的科學哲學、科學史的新發展，亦有所回應；而對法國年輕一輩的科學哲學家如拉庫赫及謝赫 (Michel Serres) 亦有所評論。

最後，或許該回答爲何要在台灣譯介岡居朗這個問題。醫學乃至更廣義的生命科學的發展，近年來在台灣也產生或遭遇了一些問題、新的爭論乃至新的宰制與抗爭。例如全民健保、專科醫師制、醫藥分家等所會帶來的制度改變與新的利益分配。又如新的科技所導致的難題，如器官移植或胎兒絨毛膜檢查所帶來的醫學倫理問題。還有些新的現象導致一些混亂的新形勢，如目前有關愛滋病與同性戀，以及安非它命及其它藥物所引發的討論等，這些可能會導致一些危險的、極度壓制性的措施或制度。此外，當然還有一些長久爭論的問題，如安樂死、性問題、墮

Jean Hyppolite





新世紀的女孩與女性的新救星：家庭科技

胎……等等。

一般人似乎尚未清楚覺察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般報刊則常以醫療新知、科技奇觀或社會新聞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一種天真的科學主義也常令人無法深入地檢討這些問題。

然而，在醫學界及醫學院的學生中，已有一些人開始尖銳地意識到這些問題，而且帶著極大的好奇、關切與不安。尤其是在精神科這門地位最微妙，問題最尖銳也最和社會人文科學有關的學科中，有著最多的年輕醫師關注這些問題。而某些醫學院的社團也開始有計劃地要探索這些議題。於是大家開始在黑暗中摸索，現成可以仰仗的工具並不多，一些公衛的知識及某些老掉牙的醫學社會學觀點罷了，很多人都覺得不切實際也不知如何切入。許多人開始尋找，有人從政治經濟學入手，試圖以此來分析醫療體制。有人開始閱讀英文界較新的醫療社會學著作。也有人開始讀醫學史，而且是相當細膩而專門的，如精神醫學史、心理學史、神經學史乃至更細分下去的精神分析史或失語症學史(Aphasiology)等等。也有人走更激進的閱讀方向，讀傅柯的著作、反精神醫學運動的著作等等。有些人對台灣醫學史產生相當大的興趣，尤其像體質人類學這類具爭議性與殖民主義關係複雜的學科更是如此。然而障礙也是十分巨大，一是語言的問題，包括日文、德文乃至拉丁文——後二者已消失在現在的醫學教育中矣。一是缺乏分析的工具、理論、概念等。

無論如何，在專業團體中出現此種跡象，雖只是其中極少數的一部份人，亦是極具症候性 (symptomatic) 的。

因此，在此時介紹岡居朗是十分恰當的。其理由，這兩篇文章內容本身就是很好的說明，毋須在此贅言。我相信對任何關切這類問題的人而言，岡居朗的著作將會是個極有用的參考與極豐富的資源。

註釋

1.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P.257) .tran, Ben Brewster.
2. 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 (P.4) .tran. Matthew Adamson.
3. Georges Canguilhem,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P.33~34 tran Carolyn R. Fawcett, Robert S. Cohen.

岡居朗的主要著作如下：

-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1943, 1966) 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1952)
 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1955)
 E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1968)
 Idéologie et rationalité 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vie(1977)